

傅连璋 44岁才入党的开国中将

傅连璋,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却是共和国的开国中将;出身基督教徒,直到44岁才被接纳入党。

从教会院长到红色院长

1894年中秋节这一天,母亲官福娣生下傅连璋。因他出生时正值日出,故起名“日新”,后改名“连璋”。由于受生活所迫,傅连璋的父母加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当地开办的教会,因为入教可以得到些许生活补贴,子女还可免费进入教会学校读书。

就这样,傅连璋在教会创办的学校里读完了小学、中学,毕业后考入教会创办的“亚盛顿医馆”学医,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1927年对傅连璋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一年是后来组织上认定他开始投身革命的一年。8月,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军转战至汀州,时任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带领全体医护人员倾力救治起义军的300多名伤病员,其中包括一名营长,这就是建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赓。傅连璋倾力救治,保住了陈赓的一条腿。时任起义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已年过五旬,由于患急性肠胃炎而高烧昏迷。傅连璋精心救治、悉心照料,使其病情迅速好转。陈赓和徐特立乐观坚定的革命精神,也深深感染了傅连璋,他不由感慨:“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他们治好了我的心。”

1929年,对傅连璋来说,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因为这一年他结识了毛泽东。傅连璋早就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但一直无缘相识。3月的一天,福音医院里来了两位气宇不凡的红军干部,这就是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和军长朱德。傅连璋为二人仔细检查了身体,毛泽东也关切地询问了医院的情况。考虑到当时军中有天花病人,傅连璋建议为红军将士接种牛痘。毛泽东和朱德欣然同意,朱德还带头接种。

在毛泽东等的影响下,傅连璋对红军的认识进了一步,也坚定了他为红色事业做贡献的决心。其后数年,国、共两党在汀州展开争夺战,汀州政权几度易手。傅连璋借助医生的特殊身份,利用给驻扎汀州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治病的机会,取得其信任,不仅在白色恐怖下为我党培训了上百名农运骨干,还由于及时通风报信,使中共汀州地下党组织免遭国民党的破坏。

当时的汀州,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注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这里距红色首都瑞金仅40公里,被誉为“红色小上

海”。1932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中共福建省委、福建军区等机关在这里相继成立,汀州已成为福建革命运动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也是中央苏区重要的经济中心,而傅连璋所在的福音医院已成为中央苏区当时最大的一所医院。然而,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面临严重的药品短缺问题。傅连璋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上杭、峰市、汕头等地开设地下药房,建立起一条从汀州至上海的地下药品运输线,有效解决了苏区药品困难问题。为适应战时需要,他还应中央要求,在汀州创办首个“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翌年又在福音医院开办“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他兼任校长和教员,为红军培养了首批医务工作者。

从基督教徒到共产党员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毛泽东忧心如焚,在于都病倒了。1934年9月,毛泽东连续数日高烧不退,几乎粒米未进,福音医院派去的医生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主持中央苏区政府工作的张闻天派傅连璋前往于都为毛泽东治病。傅连璋日夜兼程,抵达后来不及擦把汗就开始为毛泽东量体温、做体检。结合多年临床经验,他判断毛患上了恶性疟疾,若救治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他对症下药并悉心救治,到了第四天,毛的体温恢复正常,气色也逐渐好转。傅连璋还不放心,又在于都待了6天,直到毛泽东基本康复,他才千叮咛万嘱咐地返回了瑞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长征。考虑到傅连璋体质弱,无法承受长途跋涉之苦,中央打算让他留在苏区,在项英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但傅连璋坚决要求与大部队一起转移。他的请求得到组织批准,但为了照顾他,上面专门派两个战士用轿子抬着他。他不愿搞特殊,坚持自己走路,不久就学会了骑马行军。长征途中,傅连璋在顾及全军将士的同时,还竭尽全力做好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他经常拖着羸弱之躯,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治病,照料他们的健康。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曾患重病,他全程参加了治疗。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傅连璋随红四方面军(左路军)长征,负责红军总司令部的医疗保健工作。1936年6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傅连璋奉命到粮食总局运输连给战士们体检,并详细介绍红眼病和其他疾病的防治办法。为了让更多人掌握必要的防病治病知识,傅连璋经



傅连璋

局长何长工同意,从该部挑选了14人,组成一个医疗培训班。由于条件简陋,这个随营培训班只能一边行军一边授课。傅因地制宜,采取简单易懂的实物教学法,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1937年1月,中央机关从保安县迁至延安,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后改称陕甘宁边区

医院,傅连璋任院长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由于经常熬夜,毛泽东一度受眼病困扰,经傅连璋精心治疗而痊愈,毛泽东高兴地称赞他是当代的“红色华佗”。这一年,恰好有一名法国记者在延安采访,他惊讶地发现傅连璋的基督教徒身份,于是对他做了专题采访。同年5月,法国记者在法国《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名基督教徒医生在中国红军的十年经历》的报道,引起国际轰动,并引发不少国际友人和进步之士慕名前往延安,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加入共产党是傅连璋的最大心愿,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他在汀州担任福音医院院长时,毛泽东认为,他的基督教徒身份对革命更为有利;在他走上革

命道路并出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后,毛泽东本准备介绍他入党,却又开始了长征。他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时,又因为给张国焘写了一封信而遭到审查……再加上他原来的基督教徒身份,入党问题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一再耽搁下来。1938年年初,傅连璋被任命为中央总卫生处处长。5月,他被指派到西安采购器材和药品,傅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经过中央党校班学习,1938年9月7日,44岁的傅连璋被正式批准入党,入党介绍人是党训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经过11年的组织考验和战争洗礼,傅连璋胸怀一颗对共产党无限赤诚之心,终于了却了夙愿,也完成了从基督教徒到共产主义者的巨大转变。

据《党史博采》马荣升/文

“教师节”差点定在5月5日

1981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案由是: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

提案人是徐伯昕、吴贻芳、史念海、李霁野、张明养、叶至善、徐楚波、郑效洵、马力可、霍懋征、葛志成、方明、巫宝三、张景宁、叶圣陶、雷洁琼、柯灵(此为原件签名顺序)。提案理由是: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后来,该提案被全国政协编为第170号提案。

其实,这并非我国第一次提出“教师节”的概念。据本报1985年1月16日1版《何东昌作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说明》一文记载,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领导人发表书面谈话,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同

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实际上并不存在。

“文革”中,教师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开始提高,但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的思想也还不够普遍。

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政协委员们听取了很多建议。其中,冰心建议定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叶圣陶建议定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开学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

1981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接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了解到设立教师节的事,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起来写报告请示中央。

1982年4月,一份“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至中央书记处,报告中建议以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为

教师节。

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再次联名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同年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同意恢复教师节。

1984年底,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在一次座谈会上发出倡议:由国家确定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并将该月的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1984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倡议每年九月为尊师重教月》)同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并报国务院。报告建议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在新学年开始,新生一入学,即开展尊师活动……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设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据《北京日报》

瓦德西曾是辜鸿铭学生?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远遁西安。辜鸿铭对曾在辜家学习六七年的兆文均说,自己是“东南互保”(英美帝国主义与清南方各省巡抚达成的保护协议)的首倡者(其实辜只参加了张之洞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的一次会谈而已),且参与了在北京的谈判。

据兆文均记,离武昌赴京谈判前,张之洞问辜鸿铭是否有把握,辜昂然道:“真理在握,正义在我,何惧鬼子横行。”

当时的辜鸿铭称,自己在法国游学时,曾住在巴黎某名妓家,有个德国小贩每天替名

妓跑腿,此人是文盲,但很有志气。应名妓要求,辜鸿铭教这个小贩学德文,后者还向他下跪叩首行拜师礼,没想到这个叫瓦德西的小贩后来竟当上八国联军统帅。

在谈判中,瓦德西态度最嚣张,辜鸿铭便让庆亲王设私宴。宴席上,瓦德西依然撒野,躲在屏风后的辜鸿铭跃出,指责说:“瓦德西,你太无礼!你没资格代表你们光荣的凯萨。我马上给德皇陛下去电报。”

瓦德西吓了一跳,被辜鸿铭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当场表

示“整顿联军纪律”。如果不是李鸿章临时背叛计划,清廷赔款至少可按辜鸿铭的方案,减少2亿两。

梁漱溟先生看了这段“记录”,写了“后读记”,说:“久仰辜先生通习欧洲古今多国文字,但我却未料想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他竟参与了中外当局折冲交涉。”

而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则揭破了其中谎言:瓦德西比辜鸿铭年长25岁,辜鸿铭在法国读书时,45岁的瓦德西正担任德国驻法大使。

据《北京晚报》蔡辉/文